

【文学与艺术研究】

《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与价值重估^{*}

席 格

摘 要:从书写是“人”“地”关系建构的重要方式看,《洛阳伽蓝记》可谓杨衒之抒发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所促成的“恋地书写”的审美结晶。北魏洛阳作为拓跋鲜卑南迁塑造正统而营建的都城,与杨衒之所秉持的华夏正统价值观念和以都城为核心的天下观念内在契合,从而赢得他的深度认同。因此,杨衒之在洛阳为官生活期间,在都城空间对他产生情感激发和他主动感知洛阳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与洛阳形成了深挚的情感关联。当北魏灭亡后杨衒之重返故都遍览洛阳丘墟时,这种情感关联跃升为“恋地情结”。在抒发“恋地情结”和载录故都辉煌历史意识的共同促使下,杨衒之采用“记”体与“合本子注”体例相结合的书写形式,将人文地理性书写、情感书写与生存经验书写等有机融入《洛阳伽蓝记》中。《洛阳伽蓝记》通过全景式再现北魏洛阳,保存了都城规建、佛教传播、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等足以补证史书的珍贵史料,同时自身也因诗情、赋笔与史识的结合而成为北朝文学的代表作,从而展现出多元敞开的价值。

关键词:《洛阳伽蓝记》;恋地情结;北魏洛阳;审美地理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6-0149-09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是一部经典文献,但自隋以降,它一直存在着类属分歧。著录者或将其归入释家类、地理类、历史类和小说类中的一种,或将其同时归入不同的类属,以致造成“互著”现象。即便是在当代研究中,这种类属分歧仍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或偏重地理,或偏重历史,或偏重文学,甚至将其作为史地文的综合体。《洛阳伽蓝记》存在类属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丰富多元的内容,这使其在不同类属维度凸显出相应的类属价值。至于这种类属含混、内容丰富和价值多元的特征是何以形成的,在《洛阳伽蓝记》研究中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阐发。这一问题的悬置束缚了研究的拓展深化,已经成为进一步发掘《洛阳伽蓝记》价值的瓶颈。而要直面《洛阳伽蓝记》的文本特征问题,需要突破先前从文本内容出发的研究理路,引入新的理论视角。段义孚在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人文地理过程中,针对“人”“地”关系建构提出的“恋地情结”理

论,为我们从作者创作动因的新维度切入讨论《洛阳伽蓝记》提供了可能。

所谓“恋地情结”,段义孚明确认为,“是人与地之间的情感纽带”^①。从“人”的维度来看,“恋地情结”的生成,既取决于个体对地方空间的感知能力和所秉持的态度、价值观、世界观,又深受个体所处时代政治、经济、宗教信仰和文化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就“地”的维度而言,“恋地情结”的生成,则取决于特定地方空间对“人”情感的激发程度,也即“恋地情结”深受其物质生存环境 and 精神文化生存环境的制约。当作者借助书写抒发自身关于特定地方的“恋地情结”时,便形成一种集地理性、人文性、情感性和开放性等为一体的“恋地书写”。这类书写具有强大的文学绘图功能,不仅能够客观描绘特定空间的自然地图,而且可以建构出特定空间的人文地图、精神地图和审美地图。从作品内容看,“恋地书写”文学绘图功能的发挥,建立在作者的“恋地

收稿日期:2022-03-06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北朝审美观念研究”(20FZXB013)。

作者简介:席格,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学博士(郑州 450002)。

情结”之上,同时,又在书写具体展开过程中,达成对个体化情感的超越,展现出对命运、家国、历史甚至宇宙的深情与哲思。从作品形式来看,作者所选择的诗、赋、记、词等具体文体形式,则会影响抒发“恋地情结”的深度、书写绘图的精度和囊括内容的宽度等。据此,“恋地情结”理论及由其生发的“恋地书写”,从作者与特定地方情感关系建构与抒发的维度,为《洛阳伽蓝记》提供了一条可行的新的阐释路径。杨衒之在抒发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时形成了深度“恋地书写”——从地理书写出发、向多维度内容敞开,从而达成对都城空间的立体绘图、全景再现,并由此呈现类属含混、价值多元等特征。

一、杨衒之的洛阳“恋地情结”

作为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纽带,“恋地情结”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随着人在地方空间内生存经验的积累逐渐培养、建构起来的。杨衒之的北魏洛阳“恋地情结”,是他在洛阳生存过程中逐步积淀生成的。但因杨衒之在《魏书》《北齐书》《北史》等文献中无传可查,因而无法较为确切地知晓他在北魏洛阳的生存时间、家庭背景和交游状况等。值得庆幸的是,《洛阳伽蓝记》中的两则材料,足以证实杨衒之曾在洛阳为官生活。一是书中直接述及他曾经登临永宁寺佛塔:“衒之尝与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临云雨,信哉不虚”^②;二是在解释华林园“苗茨碑”的命名时,述及他曾任职奉朝请:“永安年中,庄帝马射于华林园,百官皆来读碑……衒之时为奉朝请,因即释曰:‘以蒿覆之,故言苗茨,何误之有?’”^③正是在洛阳的这种切身生存经验,使他能够详观细察洛阳生存空间、立体感知都城生存状况,并在此过程中与之建立深厚感情。而他观察的精细程度、体验的深刻程度和情感的强烈程度等,均作为再现繁华洛阳的内容被写进了《洛阳伽蓝记》中。基于此,借助《洛阳伽蓝记》的具体内容,可以反观杨衒之对洛阳空间的感知和洛阳空间对他情感的激发,进而揭示其洛阳“恋地情结”何以生成。

1. 对北魏洛阳全方位的生存感知

在洛阳生活期间,杨衒之通过感官乃至全身心的投入,对都城空间形成了深刻而细腻的感知。在视觉感知维度,有恢宏的城门和规整的里坊,有栉比的佛寺和骈罗的佛塔,有壮丽的府邸和奢丽的园林,等等。杨衒之对都城建筑的体察,既看到了洛阳的

壮制丽饰之美,又抓住了洛阳因佛寺广布而形成的显著特征。在听觉感知维度,有佛塔上的铎声、佛寺里的钟鸣,有鸟声、蝉鸣,有铙、笛、笙、篪等乐器演奏,有歌伎的演唱和僧人的诵经声,等等。杨衒之通过各种交织错杂的声音体验,捕捉到了洛阳空间的生机和灵动。在味觉感知维度,既有梨、柰、桃和石榴等水果,又有洛水中的鲤鱼、伊水中的鲂鱼等水产品。杨衒之通过物产美味,发现了洛阳别样的生存韵致。此外,他还以“身体”去体验礼制建筑及其布局所营造出的皇权威严,感受佛寺建筑营造出的信仰神圣等气氛。

当然,杨衒之并没有局限于对北魏洛阳物质生存维度的感知,而是带着自豪、真挚、深切和细腻的情感进一步关注到了北魏洛阳所承载、囊括的历史、思想、文化等内容。书中通过孝文帝、元彧等组织宴饮雅聚赋诗活动,凸显拓跋鲜卑的汉化程度、胡汉民族融合和中原文化的主体地位;通过永宁寺代表的佛教建筑对宫城建筑规制的模仿,展现中外文化审美观念的融合;通过孝文帝与王肃关于羊肉和鱼羹、酪浆和茗饮比较的对话,借助饮食习俗展现北方草原文化、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通过华林园中建有蓬莱山、仙人馆等道教建筑,展现出洛阳宗教信仰的多元;通过西域僧人、胡商、工艺品等,展现中外文化艺术的交流。杨衒之对洛阳既细致入微又不失宏观的感性认知,为他“恋地情结”的生成奠定了现实基础,为他目睹洛阳丘墟后再现繁华洛阳提供了可能,进而也为《洛阳伽蓝记》赋予了现场感、立体感和包容感。

2. 对北魏洛阳的认同态度

杨衒之深度感知洛阳的前提,在于他对拓跋鲜卑政权营建都城洛阳的接受与认同。北魏洛阳能够赢得包括杨衒之在内的汉族士人认同,关键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拓跋鲜卑政权以汉魏晋洛阳旧址为基础,以儒家都城审美理想为参照,并借鉴汉魏晋洛阳、曹魏邺城、南朝建康和北魏平城等都城建设经验,重塑洛阳正统形象;二是推行和完善礼乐教化制度,国家祭祀从西郊转向南郊,形成以南郊为核心的礼制祭祀体系;三是主动实施以“夏”变“夷”政策,禁胡语、胡服,改汉姓,与汉族通婚,加速南迁胡族汉化,等等。从杨衒之基于历史责任感撰写《洛阳伽蓝记》和在具体叙述中所抒发的强烈的家国情怀来看,他对北魏洛阳的认同态度是不容置疑的。他在

《洛阳伽蓝记》中既宏观描述洛阳的建筑布局和社会风貌,又准确记述寺院、官署、里坊、府邸和市场等的地理位置、建筑造型、关联历史事件和逸闻趣事,甚至于奇珍果木等,这不仅是他对洛阳空间状况熟稔于心的表现,更是他对洛阳内心认同和情感深厚的表现。在南北正统之争和夷夏之争的时代背景下,杨衒之的书写直接表明了他对洛阳正统的认同。如借菩提达摩称永宁浮图“极佛境界,亦未有此”^④和佛教行像活动中“时有西域胡沙门见此,唱言佛国”^⑤,凸显洛阳在佛教信仰中的至高地位,进一步肯定、推崇洛阳。

基于对北魏洛阳的深度认同,杨衒之在记述佛塔、园林、府邸等壮丽奢华的建筑时,在记述盛大规模的佛教行像活动时,在记述万国来朝、胡商荟聚和四夷归附等内容时,都洋溢出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如借萧梁陈庆之称颂洛阳:“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⑥不难见出,杨衒之对洛阳发自内心的认同态度,成为一种内在驱动力,促使他带着深挚的爱去感知洛阳、体验洛阳、书写洛阳。

3. 华夏正统的价值观念

杨衒之之所以对拓跋鲜卑统治下的洛阳产生深度认同,华夏正统价值观念是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传统民族观念重文化而不重血统,对夷狄强调“以文化之”,而孝文帝不仅以“华夏”自居展现出“人的自觉”,还积极用“夏”变“夷”彰显出“文的自觉”,加速了南迁拓跋鲜卑的华夏化。正因为如此,逯耀东明确指出:“孝文帝最后却放弃邺,而选择洛阳,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的文化理想。”^⑦从根本上说,孝文帝将都城从北方游牧混合地带的平城南迁到“天下之中”的洛阳,就是为了利用洛阳空间的正统性,营建作为正统象征的都城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杨衒之作为汉族士人,从乡野坞堡进入都城洛阳,带着深挚的情感去感知洛阳空间,本身就意味着对洛阳作为正统象征的认同。这从《洛阳伽蓝记》以佛寺为记述主题,却重点关注拓跋鲜卑华夏化和洛阳正统形象足以见出。

杨衒之借孝文帝、孝庄帝和陈留长公主等拓跋鲜卑权贵赋诗,彰显胡族汉化程度之深。同时,他借洛阳作为“王都”的空间规制,既展现拓跋鲜卑对中

原文化的深度认同,又凸显洛阳的正统形象:由宫城、内城和外城郭构成的“三重城”宏观布局;宫城位于内城北部略偏西,大市、小市和四通市三个市场都位于宫城之南,“前市后朝”的布局调整;都城空间布局的轴线设计原则,形成了从宫城阊阖门至宣阳门再至圜丘的南北轴线和从东阳门经宫城阊阖门前至西阳门的東西轴线;由太庙太社、圜丘和明堂等组成的礼制建筑体系;规划整齐的里坊等。显然,北魏洛阳对华夏正统、德政仁治、礼乐教化象征审美理想的追求,符合杨衒之的都城审美期待。他因此生发的认同态度,不仅直接影响了他对洛阳空间感知的精度、深度和广度,而且影响了他对洛阳空间审美还原的叙述立场。特别是他在细微之处表明对北魏正统的维护,如将北魏称为“皇魏”:“皇魏受图,光宅嵩洛”^⑧;称南朝萧齐为“伪齐”:“综字世务,伪齐昏主宝卷遗腹子也”^⑨,直接彰显了他以北魏洛阳为天下正朔的观念。

4. 以都城为核心的天下观

除华夏正统观念之外,都城中心的天下观是影响杨衒之认同北魏洛阳、生成“恋地情结”的另一深层因素。从世界观的维度看,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行为本身,内在隐含着他对中原文化天下观的认同。这在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十月发布的《迁都洛阳大赦诏》中有较为明确的表述:“崤函帝皇之宅,河洛王者之区,绵圣同其高风,累睿齐其昌化。是以唐虞至德,岂离岳内之京;夏殷明茂,宁舍河侧之邑。逮有周承符,道光前载,姬父赞政,量极人方。微显阐幽,昭章天地之情;穷理尽性,褒博万类之表。故负斧七龄,政平人睦。遂因明辟之秋,卜以无疆之兆。仰辰紫以楷京,府灵影而树元。神龟呈祥,食维灋洛。固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万物阜安,乃建王国。”^⑩孝文帝明确认为平城不在“岳域之内”,而洛阳不仅在“岳域之内”,并且地处“天下之中”,若模仿天官营建都城,即“仰辰紫以楷京”,便可实现阴阳相合,得到上天的护佑。他在接受以洛阳为中心的天下观的同时,在营建洛阳过程中践行“象天法地”之原则,从空间格局维度展现出政治伦理秩序的和谐,以现实空间象征“天堂的秩序与威严”,赋予洛阳以正统性、象征性与神圣性。

杨衒之显然是关注到并认同北魏政权所赋予洛阳的象征意义,这可从《洛阳伽蓝记》关于洛阳都城空间布局、里坊命名、原有建筑或基址利用等诸多方

面的记述见出。如:宫城以太极殿为正殿,而洛阳为“三重城”,这便在“天下”水平方向呈现出以太极殿为核心、逐层向外拓展的同心圆空间格局;载记北魏设置“四夷馆”“四夷里”和众多归附的南朝权贵、胡商、僧人、使节等,进一步佐证洛阳的“正统”与“中心”地位;采取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和城北的先后叙述顺序,凸显内城中心。同时,他还从多个维度塑造了北魏洛阳的垂直立体空间:在儒家维度,洛阳是一个天、地、人、神共在的空间;在道教维度,洛阳是一个神、人、鬼共在的空间;在佛教维度,洛阳则是天国或佛国净土世界、人、地狱共在的空间。但无论从哪个维度看,洛阳无疑都处于上通下达、贯通人神的中心地位。进而言之,洛阳空间是水平空间与垂直空间的合一,是世俗性与神圣性的杂糅,且融功能性、审美性和象征性于一体。

5. 洛阳空间的情感激发

杨衒之与北魏洛阳之间建立的情感纽带,既是他对北魏洛阳生存环境感知的结果,又是洛阳生存环境对他情感激发的结果。因为,“环境可能不是产生恋地情结的直接原因,但是却为人类的感官提供了各种刺激,这些刺激作为可感知的意象,让我们的情绪和理念有所寄托”^⑩。从物质生存环境的角度看,洛阳的城市规划、建筑布局、建筑形态、河流和植物分布等,一方面将巨大的都城区隔为不同功能、不同大小的空间,以客观形式规范洛阳生存秩序,进而对人的活动范围、形式、时间等形成规定;另一方面,洛阳空间内的可感知对象,无论是人、建筑、声音、味道和色彩等物态化对象,还是文学艺术、思想、信仰等精神化对象,都具有借助符号化、抽象化而成为感知意象的可能。“伽蓝”作为记述主题,充分表明佛寺建筑在洛阳空间内的地位、数量、规模和艺术成就等深刻刺激了杨衒之的感知,进而促使他将“伽蓝”熔铸到了北魏洛阳审美意象之中,甚至将其作为北魏洛阳审美意象的标识。

从文化生存环境的角度来看,北魏洛阳是一个文化融合共同体:以儒道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作为基础,与因拓跋鲜卑南迁而强势植入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因统治者佞佛而加速传播的佛教文化,和以由南入北士人为主所带来的融入江南地域元素的中原文化等,在洛阳空间内冲突、交流与融合。多元文化的融合充溢整个都城圈空间,并且从日常饮食、服饰着装,到城市建筑及布局,再到文学艺术、宗教信仰

等,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可谓是全方位的。这种文化氛围滋养并促成了杨衒之昂扬、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使他能够积极接受洛阳空间生存状态,并立体式感知洛阳生存空间。

概言之,杨衒之洛阳“恋地情结”的生成历经三个阶段:一是情感培养阶段。北魏洛阳与华夏正统价值观和都城中心天下观的契合,使他以认同的态度接受与感知洛阳,从而在他体察洛阳和洛阳激发他情感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关联。二是情感积淀阶段。杨衒之离开洛阳后,在客观上形成他从乡野对都城的回望,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促使他对洛阳的情感变得愈加醇厚,成为他和洛阳关联的纽带。三是情感跃升阶段。杨衒之“武定五年(547),岁在丁卯”^⑪重返洛阳时,已经是北魏灭亡(534)、洛阳沦为丘墟的十几年后。目睹故都颓壁残垣、荒芜凄凉之丘墟惨状,在昔盛今衰强烈对比的激发下,他对洛阳的深挚情感跃升为“恋地情结”。由此,抒发强烈、浓郁、复杂的“恋地情结”,成为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的重要审美动因。

二、《洛阳伽蓝记》多维度的“恋地书写”

杨衒之因行役重返故都洛阳时,那里已由盛世繁华洛阳沦为残毁丘墟洛阳,即将被时间湮没于历史尘埃。崩毁坍塌的城郭、毁为废墟的塔庙、断壁残垣的宫殿和零乱散落的片瓦等都城建筑遗存,以及穴居石阶的野兽、巢居庭树的山鸟、游儿放牧的牛羊、农夫种植的禾黍和四处丛生的荆棘等非都城事物,这两组物象在言说洛阳荒芜的同时,也预示着它终将荡然无存,归于空无。而在杨衒之遍览丘墟洛阳惨况、触发洛阳“恋地情结”的过程中,他与洛阳的情感纽带发生了情感迁移和新变,并超越了个体化的情感。杨衒之对洛阳自豪、眷恋、温暖的情感纽带,因丘墟洛阳审美物象的激发,在进一步醇化盛世繁华洛阳美好记忆的同时,融入凭吊国破家亡的悲情和慨叹历史兴衰的深情。换言之,杨衒之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历史意识,是在他洛阳“恋地情结”的基础上被激发生成的。正是基于“恋地情结”,杨衒之以士人的情怀、史家的态度和文学的笔触撰写了《洛阳伽蓝记》,使北魏洛阳得到书写和呈现。而《洛阳伽蓝记》也因杨衒之对“恋地情结”的抒发,成就了自身多元敞开的内容,并由此凸显出“恋地书写”的多维度特征。

1. 从北魏洛阳出发的人文地理性书写

“恋地情结”作为关于特定地方或者说特定时间内特定空间的情感纽带,注定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空间性特征。对此,段义孚指出:“恋地情结是关联着特定地方的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远远不是游离的、无根基的。”^⑬进而,由“恋地情结”触发的“恋地书写”,必然是关于“特定地方”的书写。唯有如此,“恋地情结”生成的根基、缘由和内容等,才能由“恋地书写”呈现出来。因此,“恋地书写”的地理类属性可谓与生俱来。《洛阳伽蓝记》,从其名称便可直接见出,它具有地理类书写的向度:“洛阳”,即北魏都城洛阳,是被书写的“特定地方”和杨衒之“恋地情结”得以生成的根源地。同时,“恋地书写”又不局限于特定地方本身的地理书写,尤其是自然地理状况的书写。因为“所谓的‘恋地情结’,其实就是蕴含了‘爱’(philia)之模式的一套复杂环境经验,并体现出了理想的秩序当中”^⑭。

当杨衒之带着爱感知洛阳生存空间时,他自然可以更细腻地感知其中的人与物,并在感知过程中进一步强化对洛阳的情感。这便决定了他对北魏洛阳的书写必然会溢出自然地理书写,而走向一种富有情感的人文地理书写。所以,他在记述“伽蓝”时,基于北魏洛阳寺院具体地理分布状况,述及水流、物产、气候等自然风貌,同时将与之关联的宗教、政治、历史、经济、文学艺术、民俗风情和逸闻趣事等囊括其中,且浑然一体。据此,他以洛阳地理为基点,赋予《洛阳伽蓝记》以客观性,在精准描绘北魏洛阳地理风貌的同时,赋予《洛阳伽蓝记》更为丰富的内容,形象地呈现了北魏洛阳的社会、文化、艺术和审美等方面的状况。所以,从文学绘图的维度来看《洛阳伽蓝记》,它不仅绘制了北魏洛阳的伽蓝图、礼制建筑分布图、城市空间规划图,而且勾勒了北魏洛阳的文化地图、精神地图和审美地图,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北魏洛阳的生存空间样态。

2. 关于北魏洛阳的情感书写

杨衒之在“序”中明确表示自己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动因在于:“《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⑮他直接通过《麦秀》《黍离》表达自己如同箕子、周大夫一样,因目睹故都沦为丘墟之后的荒芜破败景象,产生了悲叹国破家亡的家国情怀;并因对洛阳的怀恋、挚

爱、自豪等复杂情感触发强烈的历史意识,决心为洛阳伽蓝立传、书写故都历史。由此,杨衒之的洛阳“恋地情结”与家国情怀、历史情怀等一起,成为他撰写《洛阳伽蓝记》的情感动因,并以或显或隐的叙述方式被表达出来。例如,对都城礼制空间和塔庙佛教空间的敬畏之情,对洛阳礼乐建设成效、“四夷”归附和佛教鼎盛的自豪之情,对多姿多彩世俗生活的眷恋之情,对佛塔、塑像和园林等巧夺天工的赞美之情,对尔朱氏祸乱洛阳的悲愤之情,对都城迁邙致使洛阳毁弃的无奈之情,对洛阳崩毁荒芜的慨叹之情,等等。可以说,《洛阳伽蓝记》叙述展开的过程,就是杨衒之抒发“恋地情结”、凭吊故都故国和反思历史兴衰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杨衒之对洛阳的爱与对洛阳地理空间的书写水乳交融,使得都城审美意象跃然在目,为人们铭记北魏洛阳开启了一条审美通道。

3. 基于北魏洛阳空间的生存经验书写

生存经验积累生成的过程,是人通过感官、技术、情感、理性等与特定空间生存世界建立关联的过程,也是人与地方之间慢慢生成情感纽带的过程。段义孚十分重视“经验”在“恋地情结”生成过程中的作用,认为它“乃跨越人之所以认知真实世界及建构真实世界的全部过程”^⑯。据此,杨衒之的“恋地书写”便具有了双重指向:一方面是他凭借感官实际感知的洛阳,另一方面则是他超越感知所建构的洛阳。前者是现实生存经验,注重客观性记述,如城市规划布局,寺庙、衙署、道路、里坊、宅邸、园林等的位置和样态;杨衒之登临永宁寺佛塔,解释苗茨碑命名缘由等亲身经历;孝文帝与王南寺沙门论义、昙谟最讲经、行像等佛教相关活动;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诛杀朝臣,宋云、惠生西行求取佛法等历史事件。后者则是精神生存经验,强调对想象力的运用,如北魏洛阳秩序作为宇宙秩序投射、天室映照的象征性建构;高耸的佛塔对佛教天国的象征;对洛水之神水下宫殿的描述等。这些内容指向的是审美的洛阳,营构的是洛阳意象。记述内容的审美选择和再现洛阳时审美想象力的运用,赋予《洛阳伽蓝记》以鲜明的文学特质,或被视为写景文经典,或被作为小说发展史的重要环节,或被认为具有赋体特征等。“恋地书写”基于生存经验展开,以史实为主、虚实结合,不仅充分展现了人地关系建构的复杂性,而且注定了书写内容的多元性。“因为从人的经验出

发,‘恋地情结’更能解释人与环境关系中一些模糊、矛盾和复杂的东西,从而也开放了地理知识同那些更普遍的人文、历史、艺术学科进行对话的可能。”^{①⑦}《洛阳伽蓝记》充分证实并展现了这一点。

三、《洛阳伽蓝记》“恋地书写”的形式特征

《洛阳伽蓝记》能够成为古代“恋地书写”作品的经典代表,关键就在于它并非侧重于“恋地书写”内容的某一个维度,而是综合囊括了多个维度。它内容丰富多元的重要体现,便是类属划分的含混。它被归入地理类或历史地理类等,原因在于北魏洛阳地理的确是其书写展开的根基;被归入释家类、历史类、文学类,则是因为它溢出了北魏洛阳地理的书写,走向了内容更为宽泛的历史人文书写。值得追问的是,《洛阳伽蓝记》何以能够有机承载“恋地书写”的多个维度、涵盖丰富多元的内容?这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书写形式。

1. 选择“记”的文体

从抒发“恋地情结”的角度来看,“恋地书写”并非始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就关于故都故城丘墟的“恋地书写”来看,已有《麦秀》《黍离》,屈原的《哀郢》,鲍照的《芜城赋》和吴均的《吴城赋》等;就都市壮制丽饰的“恋地书写”来看,则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和左思的《三都赋》等。可以说,诗赋是《洛阳伽蓝记》之前“恋地书写”的主要形式。相较于诗赋,“记”这种文体更强调叙事性,有更大的叙述空间,更易于展现“恋地情结”的丰富性。从《洛阳伽蓝记》可知,杨衒之采用“记”的文体,使他能够更细腻地书写自己的情感,更细致地记述洛阳的生存状况,更丰满地建构出他所感知的洛阳和理想的洛阳。就地理书写的文体形式来看,之前就有刘歆著、葛洪辑的《西京杂记》,陆机的《洛阳记》,戴延之的《西征记》,释昙宗的《京师寺塔记》等。这些以“记”命名的地理书写,都具有向历史人文敞开的特征,为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提供了重要借鉴。需要强调的是,他虽没有采用诗赋的文体形式,却深受诗赋影响。如曹虹认为:“至于本书(指《洛阳伽蓝记》)汲取辞赋手段之妙,也是作者的艺术匠心所在,即一方面调动辞赋的写作经验来为全书的内容服务,另一方面,这种文学手段或形式因其与传达内容的相得相称而彰显文学魅力。”^{①⑧}

2. 采用“合本子注”的书写体例

尽管杨衒之可以借鉴魏晋时期地理志的文体形式,但他要达成对北魏洛阳的全景式再现,抒发“恋地情结”,载录现实之洛阳并建构意象之洛阳,需要找到更为适合的书写体例。范子烨认为,杨衒之在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之格义、“合本子注”佛典的基础上形成了“《洛阳伽蓝记》新文体”,并指出杨衒之采用“合本子注”体例的原因在于:“杨氏著书时,既要广纳材料,详述史实,又要畅其文气,美其语言,为了解决‘除烦’与‘毕载’之间的矛盾,他便采取了文注分列、合体施行的撰述方式。”^{①⑨}该论断看到了杨衒之载录历史、评判历史的需要,正如杨勇所言:“余以此书虽以记伽蓝为名,实则叙录当代史迹,上自太和,下至永熙,四十年间,北魏风物,家国大事,无不备书。唯笔意婉微,言简意赅,颜曰‘伽蓝记’者,亦心存遮蔽,用护其书,左氏之笔法也”^{②⑩}。同时,范子烨还注意到了杨衒之书写表达、实际行文的需要。“合本子注”的书写体例,可以让他更自如、简洁、深情地抒发“恋地情结”:以伽蓝记述为正文,便是以洛阳地理为基础,展现洛阳的现实空间;以官署、人物、事件等为注文,即是从洛阳地理出发向历史人文的溢出、敞开,由此杨衒之获得了建构意象洛阳、展现史家观念和抒发家国情怀的可能。如果说“恋地书写”注定了《洛阳伽蓝记》内容的多元敞开,那么,“记”的文体与“合本子注”的体例则为其承载多元内容提供了形式依托。

四、《洛阳伽蓝记》的多元性价值

《洛阳伽蓝记》“恋地书写”的多维性,促成了其类属的含混性、内容的敞开性和价值的多元性。无论将《洛阳伽蓝记》强行归入某个类属,还是认为它兼具两种或多种类属,整体上都是对它内容和价值多元敞开特征的认知。需要强调的是,《洛阳伽蓝记》多元敞开的内容和价值并不是简单的拼贴或叠加,而是基于北魏洛阳都城地理空间的自然生发,即在以洛阳佛寺地理分布为线索展开叙述的过程中,有机囊括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学艺术等内容。相应地,在《洛阳伽蓝记》的诸多价值维度中,地理维度最受关注,宗教、历史、社会和文学艺术等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制约。因此,开掘《洛阳伽蓝记》的多元价值,应从其蕴含的北魏洛阳地理价值出发,逐步向北魏洛阳空间承载的精神价值延展。

1. 呈现北魏洛阳现实和审美的双重样态

杨衒之“恋地情结”生成于对整个北魏洛阳空间的感知与体验,这决定了《洛阳伽蓝记》的“恋地书写”必然要植根于整个北魏洛阳。所以,他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描绘洛阳时,在时段选择上有所延伸,实为自北魏太和十七年(493)至东魏武定五年(547)之间的洛阳城。该时期的洛阳,经历了一个从丘墟到辉煌、再到丘墟的历史过程,即从曹魏西晋之洛阳丘墟,到北魏迁都洛阳重现辉煌,再到534年北魏迁都邺城洛阳遭到严重破坏而重新沦为丘墟。杨衒之在“序”中宏观描述了北魏洛阳丘墟的状况,也即现实中的“丘墟洛阳”;在正文部分,他以文学绘图的方式,载录了北魏洛阳的空间规划、城市建筑和社会生活等,也即往昔现实中的“繁华洛阳”。在“繁华洛阳”现实样态的载述中,有关北魏洛阳都城规建的珍贵史料得到了保存,不仅为现代汉魏洛阳考古发掘和空间格局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史料支撑,而且为研究洛阳都城美学甚至管窥北朝美学提供了重要支持。盛世繁华之北魏洛阳的审美还原,乃是杨衒之依托“恋地情结”、凭借审美回忆达成的,这就意味着盛世繁华洛阳具有审美意象的维度。深言之,即便杨衒之尽力保持北魏洛阳的客观性,但审美回忆只是让他接近却永远无法达到,审美想象注定是无法抹去的。由此,《洛阳伽蓝记》关于北魏洛阳城市规建的载述和审美意象的营构,展现了南北朝时期都城审美理想的演进与落实。

2. 记载佛教在北魏洛阳的发展和影响

杨衒之选择“伽蓝”作为主题,既精准地把握住了北魏洛阳空间的典型特征,又为“恋地情结”找到了抒发路径,为“恋地书写”提供了叙述线索。因此,佛教在北魏洛阳的传播状况,成为《洛阳伽蓝记》书写的重要内容,从而呈现了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原都城的冲击。杨衒之在《洛阳伽蓝记》中通过佛寺数量的变化直接展现了佛教在洛阳的发展状况:西晋时期洛阳佛寺极少,仅有42所;北魏都洛期间,洛阳郭内佛寺最多时高达1367所;都城迁往邺城时,仅剩421所。同时,他还通过佛寺建立时间来暗写佛教兴盛时段。两者结合,可以大致推知洛阳佛寺发展的四个分期:在孝文帝时期发展受限,在宣武帝、孝明帝时期逐步突破《都城制》的限定而获得较大发展,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后佛寺激增,都城迁邺之际则骤减。从佛寺鼎盛时期数量之多可

知,佛寺在都城空间内占比之大、佛教在洛阳影响之深。面对如此众多的佛寺,杨衒之显然不可能逐一详加记述,而只能选择性地进行载录。他着重记述的是整个北魏洛阳期间具有代表性和特色鲜明的佛寺,并明确指出:“今之所录,止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②即便是他重点选取的佛寺,记述时也详略有别。整体来看,记述内容主要涉及佛寺的名称、由来、地理位置、建筑形制、关联人物与事件、宗教活动内容。深言之,囊括了佛寺得以广置的原因,由佛塔、佛殿、造像和园林等构成的佛教艺术发展状况,以行像为代表的宗教活动,佛经翻译,以及北魏政治与佛教发展的关系等。佛教建筑在洛阳的激增,使得佛塔重塑了都城高空审美、声音审美和色彩审美,佛寺成为都城重要审美景观,并作为半公共空间推动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发展。佛寺宗教信仰空间对都城礼制空间形成冲击,佛教自然审美思想推动了园林艺术对“有若自然”的审美追求,佛教行像活动引发整个洛阳的城市狂欢,佛教美学与儒家美学在建筑布局、建筑形制、宗教礼仪等方面走向深度交融。因此,《洛阳伽蓝记》是多维度研究北朝佛教发展及影响的重要史料。

3. 再现北魏洛阳时期的历史

杨衒之“恋地情结”生成的直接激发动因就在于北魏覆亡、迁都邺城而洛阳沦为丘墟的历史变革,加之他为洛阳立传、铭记故都的历史意识,使《洛阳伽蓝记》书写历史成为必然。事实上,《洛阳伽蓝记》以地写史的方式很早就受到关注,并被视为“信史”。如《四库全书提要》强调:“其兼叙尔朱荣变乱之事,委曲详尽,与史传相发明。”^③吴若準认为它“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④张煦侯曾指出《资治通鉴》对它的采用:“其参考《洛阳伽蓝记》,乃撮记胡后兴作之盛,非以文字之华侈为长也。”^⑤这些都是对《洛阳伽蓝记》作为历史史料之内容与价值的肯定。或许可以说,《洛阳伽蓝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书写。吴若準基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的历史视角,认为它是一部“拓跋别史”;王文进则是从城市视角来看,认为它是一部“北魏‘洛阳城兴亡史’”^⑥。而这些均源自杨衒之“恐后世无传”的历史意识。他不愿让曾一度辉煌灿烂的北魏洛阳彻底湮没于历史之中,努力以地理载录历史的方式,让《洛阳伽蓝记》本身成为历史书写,如记述元颢入洛、尔朱兆囚禁庄帝、

胡太后专政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他在书写过程中坚守史家的批判精神、客观精神、反思精神、实证和存疑精神,使得《洛阳伽蓝记》在多元书写展开过程中保存了北魏洛阳时期的大量珍贵史料,可与《魏书》形成参证和补充。

4. 载录北魏洛阳的社会状况

杨衒之对北魏洛阳社会感知的细腻程度、深刻程度和宽广程度,在《洛阳伽蓝记》“恋地书写”的生存经验维度得到了充分体现。仔细梳理《洛阳伽蓝记》涵盖的社会风貌内容可知,日常生活、商业经济、文化交流和宗教信仰等多个向度都得到了深度书写。以经济为例,杨衒之不仅从城市布局维度记录了洛阳四通市、大市、小市的位置,而且关注到了粮食加工、酿酒、屠宰、制瓦、对外贸易等诸多行业的发展。如他在记述洛阳大市周围阜财、金肆等十个里坊情况时,直言:“凡此十里,多诸工商货殖之民。千金比屋,层楼对出,重门启扇,阁道交通,迭相临望。金银锦绣,奴婢缟衣;五味八珍,仆隶毕口”^②,从中足以见出北魏洛阳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与洛阳社会经济繁荣相伴随的,便是多元文化融合对文化建设的推动及由此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可从汉化后的拓跋贵族喜好诗文、接受儒家教育和仰慕魏晋士人风度,中原士人对佛教思想的接受、认同,佛教信仰与道教信仰的杂糅等诸多层面见出。当然杨衒之在描绘北魏洛阳社会生活风貌时,也表达了对元氏皇室豪奢生活、胡太后乱政、佛寺林立等现象的批判和反思。

5. 记述北魏洛阳时期的辉煌艺术成就

“恋地书写”在借助审美回忆、审美选择和审美想象等再现、重构特定地方空间时,特色建筑、文学艺术等凸显空间特征和审美化生存的艺术性内容往往成为选择的重点。杨衒之所要致力铭记的北魏都城洛阳,不仅自身是城市艺术时代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是各类艺术时代最高水平作品汇聚展示的空间。所以,杨衒之一方面展现了洛阳城市艺术的辉煌成就,佐证了北魏洛阳何以成为古代都城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另一方面则重点呈现了洛阳空间内各类艺术的发展状况。关于建筑艺术,《洛阳伽蓝记》自然对佛教建筑着墨最多,对永宁寺、景明寺、法云寺等閤丽寺院建筑的描述,足以让人深切感受到宝塔林立、佛寺棋布的佛教建筑艺术成就之高。关于音乐舞蹈艺术,杨衒之记载有礼乐、佛教音乐、草原

音乐等,并特地记述了调音里、乐律里,以示洛阳音乐舞蹈从业人员之众。同时,他还记述有代表人物、具体作品和乐器等,如善于吹笛且能演奏《壮士歌》《项羽吟》的田僧超,能为《团扇歌》《陇上声》且善于吹簾的朝云,能为《明妃出塞》、善弹箜篌的徐月华,能为《绿水歌》的修容,善为《火凤舞》的艳姿等。这些音乐艺术史料,既是洛阳音乐艺术成就之高的见证,又具体展现了多元审美文化的融合。关于园林艺术,杨衒之记述了以华林园为代表的皇家园林,以景明寺园林为代表的佛寺园林,以张伦宅、元怱宅为代表的私家园林。这些园林既是对理想生存环境追求的体现,又是对宇宙认知的浓缩与象征,彰显了对中原园林审美艺术的承续、对南朝园林艺术审美的借鉴和对佛教自然审美思想的汲取。此外,《洛阳伽蓝记》中还述及了北魏洛阳时期的百戏、魔术、角戏等艺术形式。总之,杨衒之关于北魏洛阳艺术状况的记述,从整体上勾勒出一幅都城审美地图。

6. 成就一部北朝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

“恋地书写”的情感性维度,是促使《洛阳伽蓝记》成为文学作品的直接动因。从现有资料来看,自宋代《太平广记》《绀珠集》《类说》将《洛阳伽蓝记》的部分内容选录为笔记小说以来,它的文学作品价值便获得了比文学史料价值更重要的地位。当然,这并非否定《洛阳伽蓝记》对北魏洛阳时期文学史料保存的价值。书中保存了珍贵的文学史料,如为常景、邢子才、卢景裕等文学人物撰写小传,记述孝文帝、温子升等史传所不载的事件;载录姜质的《庭山赋》、常景的《洛汭颂》、孝庄帝的《临终诗》和一些杂歌谣辞等文学作品;记述了孝文帝与群臣的猜字游戏、元彧组织的文人雅聚、士人游览佛寺园林饮酒题诗等文学活动。这些都直接展现了都城与文学发展的内在关联,为研究史料薄弱、传世作品较少的北朝文学提供了重要支撑。但《洛阳伽蓝记》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在北朝文学研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古代相关著述论及其文学审美特征时,主要从语言、构思、情节等方面加以强调。如毛晋在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的“跋语”中说,“妙笔葩芬,奇思清峙。虽卫叔宝之风神,王夷甫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③,认为杨衒之文采斐然、构思清奇,甚至认为卫玠、王衍都难以与之媲美。这实则间接地高度评价了《洛阳伽蓝记》语言和叙事所富有的神韵。《四库全书提要》则是直接从体例、文采等方

面评价,认为它“体例绝为明晰,其文秣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②。在现代文学学科体系下,部分古代文学史著述虽将《洛阳伽蓝记》纳入研究视域,但主要是将它视为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类或历史类著作,从历史散文、写景散文或笔记小说等维度加以论述,并未充分发掘其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事实上,从杨衒之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审美动因来看,他是在北魏洛阳丘墟审美的激发下,为抒发洛阳“恋地情结”而有此作。基于此,《洛阳伽蓝记》乃是一部重要的都城丘墟文学作品,我们应从丘墟文学审美、丘墟主题文学史维度重新认识其价值。

综上可知,依托“恋地情结”与“恋地书写”理论阐释,《洛阳伽蓝记》的多元内容与价值能够得到深度开掘。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或者说地理空间本身内在具有意象维度,古代史地类文献大都可被视为审美地理书写,作为直接载述北魏都城洛阳的《洛阳伽蓝记》具有鲜明的审美地理书写属性;“恋地情结”“恋地书写”作为现代审美地理学的有机构成,凭借对“人”“地”情感关系建构及抒发的理论建构,可以将包括《洛阳伽蓝记》在内的古代史地文献囊括进阐释范围,展现出强大的审美阐释力。值得注意的是,“恋地情结”与“恋地书写”理论存在着“窄化”作者和作品情感的风险性,因此,必须充分注意到“恋地情结”激发时对个体性的超越,即家国情怀、历史情怀等多维度情感的植入。而《洛阳伽

蓝记》研究瓶颈的突破和多元价值的彰显,也有效检验了通过“恋地情结”与“恋地书写”理论阐释古代史地类文献的可行性与适用性,具有进一步向《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拓展的可能。当然,“恋地情结”与“恋地书写”理论的阐释范围并不局限于史地类文献,因为诗、词、赋等文学作品在根本上也是“人”“地”关系建构的书写形式,只是更为注重对情感的抒发而不注重对特定地方的再现。

注释

- ①①③[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5、168、114页。②③④⑤⑥⑧⑨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杨衒之著,杨勇校笺:《洛阳伽蓝记校笺》,中华书局,2018年,第13、66、13、134、121、1、77、1、1、267、1、190页。⑦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中华书局,2006年,第131页。⑩韩理洲等辑校编年:《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第2页。⑪刘苏:《段义孚〈恋地情结〉理念论思想探析》,《人文地理》2017年第3期。⑫[美]段义孚:《经验透视中的空间和地方》,潘桂成译,“国立编译馆”,1998年,第7页。⑬孟锴:《“空间转向”语境下重温〈恋地情结〉》,《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4期。⑭曹虹:《〈洛阳伽蓝记〉与汉晋辞赋传统》,《古典文献研究》2008年第11辑。⑮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第6期。⑯⑰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国书店,2018年,第2页。⑱吴若準:《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转引自杨衒之著,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页。⑲张煦侯:《通鉴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第97页。⑳王文进:《净土上的烽烟——洛阳伽蓝记》,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4页。㉑毛晋:《汲古阁书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责任编辑:采薇

"Topophilia Writing" and Value Revaluation of *Luoyang Qielan Ji*

Xi Ge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writ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onstru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land", *Luoyang Qielan Ji* is the crystallization of Topophilia writing promoted by Yang Xuanzhi's expression of topophilia on Luoya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ecause Luoya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ccorded with Yang Xuanzhi's Chinese legitimism value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world with the capital as the core, he deeply accepted this. During his life in Luoyang, Yang Xuanzhi formed a deep emotional connection with it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mutual effect between the emotional stimulus of the Capital space and his voluntarily experiencing the Capital. After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Yang Xuanzhi visited the ruins of Luoyang. His emotion for Luoyang was sublimated into topophilia. Therefore, under the joint promotion of expressing his topophilia and recording the gloriou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Luoyang, Yang xuanzhi adopted the writing form of the combination of "Ji" (记) style and "hebenzizhu" (合本子注) style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writing of human geography, emotion and survival experience into the book of *Luoyang Qielan Ji*. As a result, when Luoya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as reproduced in a panoramic way, the book preserved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such as the capital scale, Buddhism spreading, politics and 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ics, literature and arts sufficient to supplement the historical books, and became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literature in the Northern Dynasty for the combination of poetics, emotion and wisdom, thus showing diversified and open values.

Key words: *Luoyang Qielan Ji*; Topophilia; Luoyang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aesthetic geography